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ECONOMICS AWARD

获得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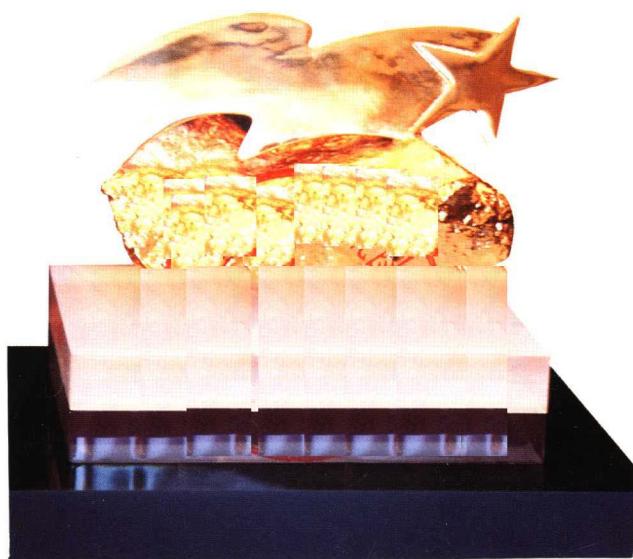
马

洪

专

集

山西经济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洪专集/马洪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10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

ISBN 7-80636-805-1

I . 马... II . 马... III . 经济学 - 文集
IV .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371 号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

马洪专集

著 者: 马 洪	网 址: 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 刘晓宇 樊 中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复 审: 宋晋平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终 审: 赵建廷	新华印刷分公司
责任校对: 马秀萍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责任印制: 李 健	印 张: 19
出版 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	彩 插: 10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字 数: 320 千字
邮 编: 030012	印 数: 1 - 3000 册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085 (综合办)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E-mail: Fxzx @sxskcb.com (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 (信息室) Jingishb@sxskcb.com (综合办)	定 价: 49.00 元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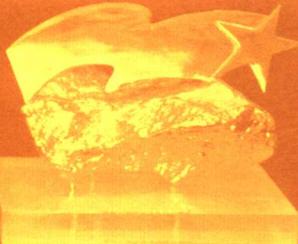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获此殊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颁奖并做了重要讲话。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此奖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进一步了解四位获奖者的杰出贡献，借鉴学习他们研究问题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一点贡献，我们精心策划了这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本《丛书》共四册：《薛暮桥专集》、《马洪专集》、《刘国光专集》、《吴敬琏专集》。每册专集均由获奖者按照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选取本人最有代表性的文章组成，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对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学家早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起到积极的作用。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年4月



授奖理由

Rewarding Reason

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马洪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1988年3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给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造成了严重障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从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巨大作用。”1993年10月马洪出版的《什么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是一部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综述和总结的优秀理论文献，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十余年来改革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和升华，对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理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马洪是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1980年他在国务院长期规划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怀疑论，一种是速成论。1987年4月，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针对当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国民收入连续几年超分配是造成财政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1989年9月，他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国务院提交了三年治理整顿的意见。

马洪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初的1977年，他在筹建社科院工经所的过程中，通过“双周座谈会”的形式分别邀请中央各部委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座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乱了的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情况摸清楚，并及时将问题和对策建议通过工经所的内刊《经济管理通讯》向中央报告。1979年中央决定用几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马洪受命领导经济结构调查组，集中了100多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查直属队，做了深入调研，形成了许多成果，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参考。他认为“我们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种20多年来形成的以钢为纲的、重工轻农的、闭关锁国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同它相关的产业政策”。由他主编的结构调查组的综合成果《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

一书，对当时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马洪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结构变革、体制变革、发展战略思想变革三大趋势，在这种变革的趋势中，必须辩证地看待我国的国情，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抓住机会，加快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他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要有步骤地改变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转变为以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面对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83年10月，国务院领导责成马洪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对策研究。他组织上百位专家参与这项研究，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对策报告。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他提出了“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主导地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重点应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和技术倾斜”的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

马洪在理论研究中强调事实和数据的运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建议》中指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常常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少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注意技术上是否先进而忽视经济上是否合理；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是定性的结论，而缺乏定量的分析。”他认为，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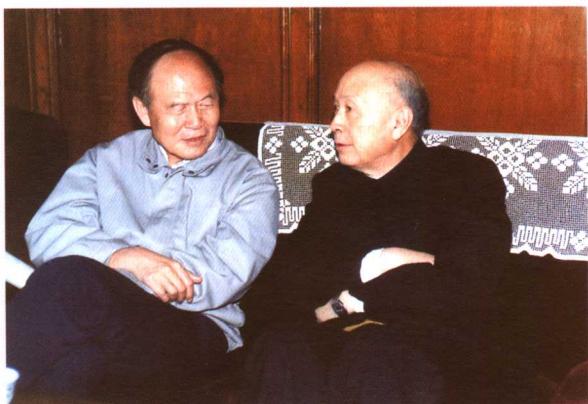
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此，他积极倡导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馬諾



1982年，在中南海办公室



1982年，在“技术革命”大会上
与钱学森交谈



2000年12月，出席上海复旦大学
“第四届东方管理论坛”



2001年5月，在北京大学孙冶方基金会，
与刘国光、吴敬琏交谈



1985年，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墓前



国务院体改办成员合影

马洪工作照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邓小平三七讲话
邓小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同时要发挥集体智慧，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反对个人崇拜。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原则和方法的初步设想和建议
邓小平：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企业自主权，企业领导者的经济责任，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精神及决定的精神、原则和方法的初步设想和建议
邓小平：有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责任制首先要先于所有制，即“所有制不变，经营权可以转移”。
邓小平：社会改革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肯定了商品经济，但同时也指出不能搞资本主义私有制。
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致的。邓小平说，我们不但要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方面都要抓。他写入决议中。因为改革不能只抓经济，我们不但要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改革，都到此说清楚了。要坐视不管，不行；但也不能走上去走来走去，这样，这样不行，这样又不行，这样又不行。要在建设的道路上走一步，再走一步。
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邓小平：社会改革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肯定了商品经济，但同时也指出不能搞资本主义私有制。
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还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小传

Brief Biography

一、简历

马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原名牛仁权，1938年春在延安时改名马洪。曾用名牛黄、牛中黄。

他出身贫寒，13岁时被当地小学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他自学中学课程，并协助当地著名爱国人士、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从那时起，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爱国思想日益浓厚。1936年初，马洪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工作，先当录事（即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当过售票员、行李员、运转员等。他努力自修学业，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开阔眼界。

1936年冬，马洪参加了“牺盟会”，积极参与同蒲铁路职工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冬，太原失守，他跟随同蒲铁路局迁到侯马。11月，在侯马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由于他工作努力，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被推选为同蒲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在同蒲铁路沿线的各段站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展开对敌斗争，并参与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8年，马洪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洪从延安被派往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后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因受“高饶事件”的牵连，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后又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

究中心总干事。同时兼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家建委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5年，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改任名誉主任。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聘为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二、治学^①

马洪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功底，是在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奠定的。他于1938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选派到马列学院学习并留校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的7年多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随同张闻天深入农村和城镇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时任马列学院院长，1942年初，为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张闻天亲领调查团，在陕北地区进行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专题、以土地占有变化与租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调查。马洪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调查团的活动，历时一年半，参与撰写了《神府县贺家川八个自然村调查》、《兴县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以及《米脂杨家沟的调查》等报告。这些学习和工作经历就是马洪治学道路的起点，同时也决定并形成了他如下的治学风格。

（一）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马洪在青年时期的学习和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奠定了他的独特学风的根基，使他终生受益。每临重大课题或决策，他总是非常自觉地从调查研究入手。

^① 摘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59～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全国解放前夕，马洪在东北局工作时，他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上。马洪亲自到沈阳冶炼厂和第一机床厂作典型调查，形成了他对如何发展城市工业的总体思路。他认为，对城市工业的管理，应按产业来组织，在产业内部应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合国情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行政管理和党的组织领导制度。他提出：东北虽是全国的工业基地，但在抓好工业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农业的工作；工业生产计划要注意均衡，注意合理调整工业结构；生产与节约并重、产量与质量并重、生产与安全并重；大力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发挥其对国有大企业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为纠正“大跃进”时期的错误，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马洪，参加了对北京10个工厂和单位的系统调查。北京第一机床厂为其中重点对象，马洪主持对该厂的调研工作。他深入企业，全面了解情况，历时半年余，最终写成《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一书。在此次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马洪参加了起草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马洪中断了十几年的学术生涯重新开始。197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去大庆考察，从政治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制度的角度对大庆的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马洪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考察。他在大庆蹲点一年，主编了《大庆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并参与主编了《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一书。

在大庆写书的后期，马洪受命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此为基础，他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并组织双周座谈会，分别邀请中央各部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他将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整个工业经济和企业的状况与问题了解得一清二楚，及时地上报中央。此后，他又接受中央的委派，主持了经济结构问题调查组。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之后，他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意见和建议。

总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贯穿于马洪整个治学过程之中，是他的本色，也是他治学的一种独特风格。

(二) 广开思路 兼收并蓄

马洪一贯主张，研究问题一定要广开思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以使前人的成果能够为己所用。他的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思想、新观点都是这样形成的。

20世纪60年代初，在制定“工业七十条”和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的时候，他不但注意搜集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条件下，还设法找到西方的企业管理学专著，组织人员译成中文，印发给大家参考。

1978年，马洪在创建工业经济研究所之初，专门设立了“国外室”，从事搜集、研究国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动向的工作。他还多次跨出国门，不仅考察了日本、美国和欧洲各主要发达国家，也考察了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认真进行国际性的比较研究。

马洪认为，要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利、稳定地发展，有必要吸取各国的先进经验，与世界进行有益的交流。1981年，马洪主持成立了由中日两国政界、经济界著名人士组成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1982年，又组织了由中日两国经济学家共同参加的“中日经济学术讨论会”，建立了固定窗口，坚持长期的合作与交流。

1983年，马洪接受国务院委派，主持“新技术革命和对策”的研究。他组织大量人员广泛搜集国际资料，在分析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马洪主张，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结合。他认为，发展经济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技术问题，孤立地从经济上或技术上来解决问题都是不行的。因此，他极力主张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认真地向自然科学家请教。为了推动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合作，1983年，马洪在中国科学院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技术攻关论证会上发表了“略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合作”的讲话，后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受到重视并被采纳。

由于马洪注意不断地汲取各方面的营养，不懈地探寻和追求新鲜事物，所

以他能够始终站在理论的前沿，保持着他在学术上的青春和活力。这也是他治学的又一独特的风格。

(三) 探索求实 参与决策

马洪认为，学风问题里，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说，做理论工作，应当探索求实，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据此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马洪治学的全过程。

马洪指出，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就是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故不可回避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而应当认真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突破。他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马洪给中央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的决议中。他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1988年，他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1993年，他出版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十余年来改革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为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马洪着重研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其范围包括：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及相应的产业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如何达到既有较快速度，又有更高效益，以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问题；企业改革与企业管理问题；人才培养问题；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等。

他先后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第一个中央级的国家政策咨询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参与了我国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的研究。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的探索。例如，在马洪主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研究，内容包括2000年的中国、新技术革命与对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